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经典文库

山西票号史

卫聚贤十著

票庄以汇兑营业，固也。

而所以大获胜利者，不仅在汇兑而在存款。

存款多则汇兑灵通，汇兑灵通则汇水利息源源而来矣。

票庄存款之收储，动辄数百方，且多不甘子息，各庄借此以营生业，而获利息。

既本少而利多，复长袖之善舞。

此票庄之所以极盛，非他行之所能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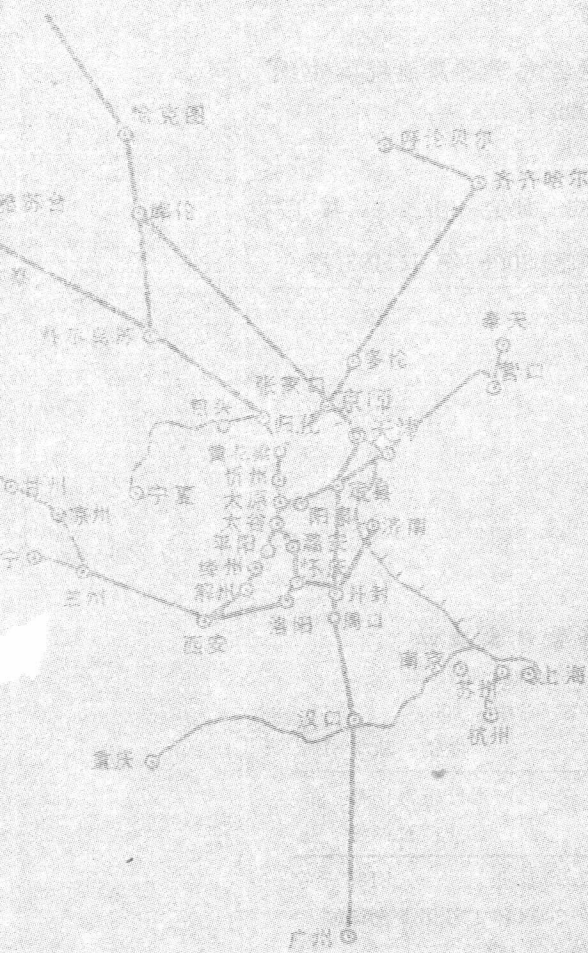
吾晋票庄祁太平二帮，共二十余家，

自光绪甲午后，为增盛时代，自庚子至辛亥，为极盛时代……

晋商研究经典文库

山西票号史

卫聚贤十著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经典文库》

编委会

学术顾问：孔祥毅 张正明

编委会主任：杨怀恩 原梅生

编委：樊而峻 郭泽光 赵国浩 崔满红 王 森
黄鉴晖 葛贤慧 武三林 阎应福 孙长青
张亚兰 王永亮 乔 南 陶宏伟

主 编：崔满红

编辑部主任：王永亮

编 辑：陈 啸 薛秀艳 杨志勇 侯海燕

总 序

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在经济、管理、社会、艺术、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学术界对晋商的关注始于清末民初。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关于晋商——特别是票号——的史料汇编、调查报告、论文、论著，比如李宏龄的《同舟忠告》（民国六年太原监狱石印）和《山西票商成败记》（民国六年太原监狱石印），韩业芳的《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民国十年煤油印），双一的《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山西省》（《钱业月报》第二卷第十二号），严慎修的《晋商盛衰记》（民国十二年铅印），东海的《记山西票号》（《银行周报》第一卷第七、八号连载），范椿年的《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央银行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卫聚贤的《山西票号之起源》（《中央银行月报》第四卷第六号）、《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三号至第七卷第二号连载）和《山西票号史》（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出版），秦省如的《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上之地位》（《钱业月报》第十五卷第七号），陆国香的《山西票号之今昔》（《民族》第四卷第三期）和《山西之当质业》（《民族》第四卷第六期），蒋学楷的《山西省之金融业》（《银行周报》第二十卷第二十一期），侯兆麟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山文化教育馆季

刊》1936年冬季号），李渭清的《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二号），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等等。这些文献既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本身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堪称经典。然而，这些文献原件印行、出版的时间均已久远，现存世稀少，且纸张脆化，墨色退变，会越来越严重地限制着其对后人学习、研究的作用。

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类高等学校之一，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始终是学校的优势学科，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近年来，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突出办学特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构建学科体系、培养商科英才作为办学指导思想，并加大了各项投入，在科学研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为了便于学界同仁学习和研究，把晋商文化教育和晋商史学研究工作推向深入，我们对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编辑成册，资助出版了这套“晋商研究经典文库”。

文库首批共有五册，分别是：

卫聚贤著《山西票号史》。根据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版重印。原书为繁体竖排，重印时改为简体横排。另外，原书末附录有11篇（包括文后附文共13篇）文稿，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并出于对原作者的尊重，我们在编辑时将这些文稿抽了出来，汇集在本文库之《晋商研究早期论集（一）》中，本书末只列有附录文稿的目录，不再重复文稿内容。

陈其田著《山西票庄考略》。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重印。原书为繁体竖排，重印时改为简体横排。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金融》。根据（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华丰印刷铸字所1937年版）第八编“金融机关”重印。

《晋商研究早期论集（一）》。汇编了关于山西票号的调查报告、论文、信函、演讲稿等共计29篇。

《晋商研究早期论集（二）》。内容包括专门讨论山西金融业的论文、调查报告，涉及山西票号的论文、调查报告，关于汉口、库伦、营口等晋商活动重镇的商业金融问题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作为票号衰落时期背景知识的有关文献，共计 37 篇。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尊重历史事实，保持原书风貌，在本文库的编辑加工过程中对原书的文字表述、体例、年代及数字表示、计量单位等均未作改动。此外，本文库的出版纯为学术研究之目的，加之出版在即，时间紧迫，虽经编委会一再联络，亦未能与上列个别著作权人及单位取得确切联系，相关事宜请致信本文库之编委会。

希望本文库的出版对社会各界有所裨益！

杨怀恩 原梅生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序

余在山西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时，曾听韩业芳及严慎修讲过山西票号故事，但其时票号事业已失败，余以为这是历史上的陈迹，因余时尚未研究经济史，故未注意及此。后各省友人闲谈中，以余为山西人，而又研究历史，也曾研究经济史，故尝以山西票号之故事为问。尤其是顾炎武发明票号一节，人多乐道之，而与余所闻为雷履泰所发明者异。但孰为票号发明者，则未暇究。

二十五年奉命赴山西调查票号，所得材料甚多，略加整理，分期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出版之《经济月报》中发表，目的是印成单行本若干，寄回山西太谷、祁县、平遥赠送曾在票号中工作过的人，以求校正其错误，补充其材料。结果因全面抗战，所得补充的材料甚少，于是编成山西票号史，分订为上、下两册。

山西票号史两册，只有稿本一本，没有副本，跑警报时也要带上跑，怕轰炸了以后再编不起来了。又明知其中遗漏错误甚多，请教别人吧？也是因为只有原稿本一本，在此轰炸期间不放心。出版吧？又怕遗漏太多而不宜。是以牵延至今，现在才决定出版了。

原稿中照相及会票等，需要作铜版锌版的，现在一概省略了。这是因为这仍是稿本，不过印上四千本，送对于票号有研究的人看过，加以校正与补充。纸型也多打一付，保存下来，待抗战胜利后，再版若干本，送到山西太谷、祁县、平遥去，以作我第二次调查山西票号之蓝本。

票号的发明人，传说是顾炎武，经我的考证，顾炎武与傅山及戴廷枋为推翻清室做革命工作而创设标局。标局是代商人运现，票号是抵制标局运费之大而设的。票号是谁发明的？传说是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经理雷履泰，但无直接证据。而山西金融之中心，确系太谷，即以标期而言，山西

之标，分为两种；一为太谷标，即太谷一县之标；二为太汾标，即太原府所属之祁县、榆次，与汾阳府所属的平遥、介休之标。在地域上讲，太谷也不是独偏于东而另划分一区，实系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势力，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故独为一标。且各路运汇来之现银，先集中太谷；办收交，开利率，悉以太谷为先为准。又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之“孟合”二字，即当做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票号固以汇兑为业务，而资本不雄厚，则不能运现以接济，余调查票号时，太谷县协成乾票号股东孙培基对余云：“票号是太谷先发明的，约在乾隆年间”，其人为举人而善于掌故，其所云不能无因，但究竟如何？尚待第二次之调查。

太谷之领袖票号为志成信、协成乾，志成信为最老，协成乾系志成信之伙友分设者。志成信在外设有标局，名曰志一堂，系送现银，有账可稽者在道光年间，且该票号在北京仍用志一堂名号。是志成信在太谷票号中为最古。志成信之股东有孔行素堂者，即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庸之先生之家也。其家人多有习票业者，咸丰时有孔宪仁先生为志成信之股东兼经理，对志成信业务曾大为扩充也。票号在昔时为最完善之金融机构，孔庸之先生承其家学，而应用于现今之财政，此抗战以来财政之所以有办法者即在此也！故余将山西票号以历史的眼光先编为《山西票号史》一书，至票号中之奥妙，余为门外汉，有待于将来补充本中说明。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一日

卫聚贤记于说文社之聚贤楼

编纂经过

山西票号兴起于道光初年，失败于民国初年，在这八十年间，对于汇兑通畅，调剂各地金融，代理国库，协助政府财政，在银行未成立之前，而有此大规模之金融机构，实为中国经济史上之重要阶段。但尚少有系统的记载，以明究竟。中央银行总裁孔庸之先生，对此特为注意，于民国二十五年冬派贤从事调查山西票号事迹。

当余调查票号时，未有对于票号有系统的书籍出版，以资参考，是以先从访问着手，对于票号的名称，成立及歇业的年月，资本数目，几年一账，普通每股每账开银若干两，最多开过若干两，股东某人，经理某人，系某县某村人，将此概况在商会招集曾在票号为经理者询问，又到各股东家中去访问。

为证实各票号成立的时期，在太谷、祁县、平遥各地大庙中将碑文看过，有无票号的名称在上，但是由山西教育厅通令府十县所抄之碑文，多抄其序文，而将布施人未抄，是以查不出票号的名称。

票号的股东及经理已故的，因欲从其生卒年月上知道一点票号的事迹，乃至各家，阅其家谱，看其本主，并搜集其墓志，亲至墓上抄其墓碑。又请其后人或其亲友代为作传。

票号中各种账簿，报告清册，往来信稿，以至会票执照等，均为票号史中重要材料，乃为搜集。至于票号门首之招牌，多为拍照，印章多为盖过。房屋以及股东经理之住宅，大部分皆照过相。

因无参考资料，余亦非票号中人，故搜集材料时，漫无目标，见到材料就搜集，即将这些材料运到上海从事整理，感觉需要的未搜集到，不需

要的搜集到一大批，乃赶快整理出一部分，先在中央银行《经济月报》上发表，将发表过的印成单行本，寄到山西太谷、祁县、平遥各商会转票号股东经理等，请其改正补充。但不久全面抗战事起，邮路不通，故未能得到补充及修正的材料，是以将前次所得的材料，编为《山西票号史》一书，拟先发表，作为蓝本，待抗战胜利后，再去详细调查，出一较完全的《山西票号史》。

卫聚贤记于上海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一日

目 录

一、历史	1
(一)票号的前身	1
(二)票号产生的原因与时代	6
(三)票号的盛衰	9
二、概况	15
(一)太谷帮	15
(二)祁县帮	18
(三)平遥帮	22
(四)外帮	27
三、组织	29
(一)成立	29
(二)资本	32
(三)人员	34
(四)待遇	35
(五)红利分配	36
(六)分号的设立	43
(七)账簿	44
(八)各路平码及会票	45
(九)号规	63
(十)行会	76

四、人事	80
(一) 首创票号的雷履泰	80
(二) 日升昌股东李二魔子	81
(三) 继创票号的毛鸿翔	82
(四) 后起之秀的刘庆和	83
(五) 票号最多的侯魁	84
(六) 力主票号改为银行的李宏龄	86
(七) 主张改银行不成退隐的张石麟	87
(八) 天成亨经理侯王宾	88
(九) 协成乾广东分庄老板马应彪	89
(十) 志成信经理齐梦彪	90
(十一) 调度适当使票号保存至今的高钰	91
(十二) 各票号经理事略	92
五、业务	101
(一) 票庄的营业报告	101
(二) 从往来信件中观察营业状况	142
六、附录	181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历史

一种事业的产生与消灭，不是凭空出来的，是从环境需要而形成的。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失败于民国初年，兹将其产生与失败因果的关系，列举如下。

（一）票号的前身

票号的产生固在道光初年，但其产生的原因，则与中国历代货币制度有关；而近因则系戴顾等人为民族革命，创设标局，为票号的前身。远因固有货币史，不宜细载，而近因无直接史料，亦不能详述，兹为简略说明如下：

1. 货币的演变

古代以物易物，不用货币，后来为交换便利起见，则有硬货币的产生。硬货币因用贝壳做饮器，而有“贝币”；由贝币用仿造的则名“蚁鼻钱”。因用石铲为农具而有“铲币”；后仿造的名“布”。因用刀割物，则亦以刀为货币。因用石的或铜的纺织轮变成环钱，先是内外皆圆，后因币面摩擦，减少其分量，改为方孔，用方木棍穿入其中，古币至秦始皇而废（王莽时，曾一度用过），惟方孔的环钱，通行至清末。古货币多铸地名，后加法定价值，至秦汉纯用法定价值，如半两、五铢之类，至刘宋始铸年号，后世的也只铸年号，惟清末铜元上则有将铸地、年号、法定价值三者均列出的，此皆为铜币。虽其间有铁铸、铝铸，但皆名之为钱。若金之用，始自战国，状如饼形，上盖铸地之印。银之使用，较金为后，而形状亦如饼，但为长圆形。宋名为铤，至元代始铸成“元宝式”，约重五十

两，清初在新疆铸币约重一两，清中叶，东南沿海多用外国银币，清廷亦自铸，重为七钱一分，广东并铸有二角、一角的辅币。民国以来，铸有袁世凯像、孙中山像等银币，也有一角等辅币。民国二十五年，改用法币，白银收为国有，另铸二角、一角、五分的镍币，一分、半分的辅币。

交易日繁，因硬币产生不易而用软币，春秋战国时有“皮币”，形不可考，惟汉武帝时以鹿皮为之，其性质等于现在的划条。东汉用布为之，六朝则有“枋柜”于大寺院中，存放现款，由寺院开一收条，存款者持此收条交易，交付货款，其性质等于现在的支票。唐时政府于长安东西市设枋柜，存入现钱。而收保管费，又商人从各地至京师时，将现钱交各道进奏院或诸军使，领取合券，到京师取现，名为飞钱，其性质如现在汇兑。宋时四川商人王昌懿等十六家，设交子铺，凡商人以现钱交给交子铺，交子铺用同一色纸上印树木人物，以无记名式填入钱数，押字盖章，交给付钱人，远近使用，称为纸币。后由宫廷收回自印，因纸张不良，每届三年，以新钞换旧钞。元明两代，甚为通行，清在顺治及咸丰时曾一度使用，至清末，大清、交通银行成立，发行纸币。民国以来，发行纸币之银行甚多，民国二十五年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的纸币为法币。

山西票号的成立，就是因标局转运硬币不便，改为软币的会票，其方法当有采取飞钱交子的。

2. 李自成的遗金

山西祁县戴光启，于明末宣抚陕北，仕于河南，但未久致仕而卒。其子戴运昌（止菴）为河南尉氏令。当戴光启巡抚陕北，惩贪奖贤，为人民所爱戴，后因大旱，而贪官污吏又压迫人民，因而李自成等铤而走险。李自成进兵河南，对戴光启后人戴运昌优待不杀，戴运昌遂降于李自成。李自成进兵山西，惟对戴光启的家乡祁县，未杀一人。及李自成破北京，亡明社稷，戴止菴以父子仕明，悔降于李自成，因自蔚氏归，羞见家乡父老，未入祁县城，在祁县南麓台山中筑屋自居，卒于康熙六年。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无他伎俩，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往来客商，四出传布，不杀人，不爱财，不淫，不掠，公买卖，免钱粮，且将富家钱分账穷民，颇爱斯文秀才，迎者先赏钱币。山陕秀才，益信为真”（见《明季北略》二十卷之八十八页）。亦可作戴止菴降李自成之旁证。

李自成入北京，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拷打求金银，及李自成自山海关败归，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熔铸成饼，每饼重约千两，共数万饼，用骡车载走，清兵进至定州，李自成败伤，过平定州后，清兵未追。李自成自山西大道上经过时，杀人太多，恐败兵之后，再遇暗算，乃沿南山行走，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

按孙郅的家谱是：

孙高山—旺庵—有龄—陈笏—郅—淑伦—继先—廷典—步城（现年二十一岁）

孙高山生于康熙十五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孙家河村西北，有孙高山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产……乃走关东，经营产业，渐积万金。”

孙家在高山时，“家道中落”，在高山之父或祖，其家道必富，是孙高山之父或祖，有拾李自成遗金的可能，但大宗遗金，则在戴家。

李自成自受伤后，弃马乘轿，见清兵不追，到祁县麓台山，在其故臣戴运昌处休息，感其先人戴光启在陕的功德，又受戴运昌的招待，送给戴运昌的现银不少。戴运昌后将其银交其子戴廷枏，做革命的工作运动。

江苏崑山县人顾炎武，在江南谋革命不成，到山东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与傅山为友，傅山号青主，山西太原人，其祖母系明朝的公主，故与顾炎武和戴廷枏联合起革命，戴廷枏在祁县城内建立三间四层楼的“丹枫阁”。

丹为红色，枫树到秋天其叶红色，含有“朱洪”二字义，阁与武系音转（如武与物音同，物亦读如窝，窝音近阁），系暗射此为纪念“朱洪武”而设，丹枫阁记言梦见古衣冠人，指明明朝，是丹枫阁为革命策源地，已无疑问。而且有傅青主、傅须男、白居易、胡季子、薛文伯、张中宿、李凤皋、石亮四、黄石齐、马君当、阎古古、顾宁人、汪荅文、杨犹龙、王山长、施愚山、宋牧仲、吴鹿友、唐采臣、王贻上、魏环溪、冯大木、田兼山、朱小晋、李孔德、阎百诗、范彪西等“天下名士，南方多集冒巢氏水绘园。北方则丹枫阁称极盛焉”（戴廷枏墓志铭，见《祁县县志》）。

丹枫阁建筑之宏大，丹枫阁食客之多，而且阁中藏书鼎彝（《丹枫阁记》，见《半可集》）又“丹枫阁藏版，海内共知”（戴廷枏墓志铭），丹枫阁主人戴廷枏财产之富于此可知。而傅山为戴止菴传云：“棺外无余物”其父既如此之穷，其子未经商致仕，何以突富？其财当有得自李自成的可能性。

3. 标局的成立

戴廷枋、顾炎武、傅山等均文人，如何能完成革命事业，谋招徕武人为助，但恐清廷注意，利用山西人民长于经商，从保护商人及代替商人转运现金，雇佣武人为名入手，于是组织“标局”。

标局是雇佣武术高超的人，名为标师傅，腰系标囊，内装飞标，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驼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标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标，某人武艺高强，不可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标局分春夏秋冬四季运现至山西太谷县名“太谷标”，又运至祁县、平遥、汾阳，名“太汾标”，此时名为标期，又称过标。

标局是什么时代设立的，《万籁声武术汇宗》（《商务本》）云“考创设标局之鼻祖，乃系清乾隆时，神力达摩王之老师，山西人神拳无敌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标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嗣由其子怀玉，继以走镖，是为镖局之缟矢，故镖师父走镖时，有‘黑五’口号者，即看对方是否为张黑五门下之友朋孙徒也”。按戴廷枋卒于康熙三十年，标局之成立，当不在乾隆时代。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先生在他作的《磨难曲》第二十二面，有一段关于标局的记载：

“……那一位山西小举人，便问‘听说贵省大乱，年兄怎磨来？’举人说：‘乱处是太原和平阳，小弟来时雇了二十名标枪，送过平原百里外，就好了，我自己就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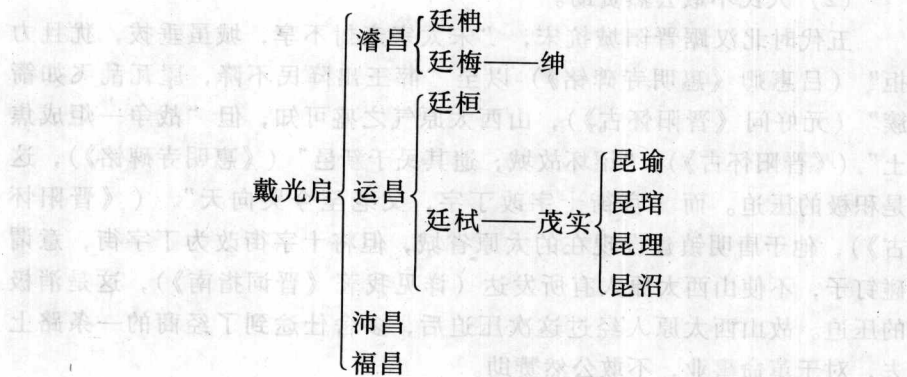
这里所谓“标枪”，“标”为“飞标”，“枪”为“长枪”，是保护行旅的，后时名为保镖即此。《磨难曲》是什么时候作的？《聊斋文集》卷上元配刘孺人行实云：

“松龄年七十，遂归老不复他游，先是五十余，犹不忘进取，孺人止之曰‘君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次为快哉！松龄善其言，领儿孙入闾，福心不能无望，往往情见乎词。”

据此，《磨难曲》系蒲松龄于五十岁时作。按蒲松龄九十岁为康熙二十八年，正在戴廷枋死前二年。是标局发源于山西〔按道光二十四年蔚泰厚京都与苏州八月二十日信稿中云：“今伊逢吉动身，跟标车三辆，每辆装标箱八只，共计二十四只，计实合足六万八千六百两，又九九松江银

五千四百两，统共合咱平银七万四千两，随开去号码一折，到日查收……随带去盘费银两百五十人，至于车价，每车京钱八千五百文，标兵三人，每人工价银十八两，酒钱在外。”九月十八日信云：“咱与日升昌沈标，俱归于志一堂运苏，大约不远，大德玉隆和又有锦标来京，交蔚丰等。”七月初十日信“东口十月标”，十二月十五日信“万金号……冬月初九日起信云：月息，春标九厘，秋标七厘，长标无市”。由此可知在道光二十四年时，标局有志一堂（即志成信），运标有标兵，每年标期分为春夏秋冬四期，且在戴廷枋、顾炎武、傅山谋起革命之时。标局为顾炎武等计划而设，后由标局产生票号，故山西人相传票号为顾炎武所计谋，非是。

此外尚有“形意拳”可证，《武术汇宗》四五页云：“行意拳法，传于山西白先生，（遗其名）后有郭芸生者，精于此拳……分为十二形，为‘龙虎猴马鸡燕龟蛇鹰熊’是也……”按此拳传自戴家，白戴声近，为万君所误听，按戴家世系是：



形意拳——祁县传为戴大旅和戴二旅所创，大旅或即廷桓，二旅或即廷枋，云此法从岳飞传下，兄弟二人在河南从老道人中学习，在十家店经商，有一二百土匪抢掠，被兄弟二人赶走，由是出名（《续小五义》中的老西白眉毛徐良，为山西祁县人，是由形意拳出名的），其传授高徒是：

戴二旅……戴良栋

李老农——车二——常友儿——戴达
乔涧溪